

南 強

丛
书

台湾社会经济史研究

台湾海疆史研究

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

国库运作与管理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法律问题研究

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

敦煌文献字义通释

➡ 明清官话音系

无机材料研究方法

武夷山常绿林研究

i N C I C i N C C U A N

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
荣
誉
出
品

厦

门

大

学

南

强

丛

书

叶
宝
奎
著

明清系
官话音系
MINGQING
GUANHUA
YINXI

U A Y i N X i

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



《南强丛书》(第二辑)编委会

主 任:陈传鸿

副主任:吴水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惠霖 邓力平 陈福郎

洪华生 黄鸣奋 蒋东明

廖益新

秘 书:陈福郎(兼) 陈武元

《南强丛书》(第二辑)序

厦门大学自创办以来已走过了 80 年的光辉历程,今年 4 月 6 日是她的八十华诞。为庆贺这一喜庆的节日,在海内外校友和全校教师的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南强丛书》(第二辑)。

《南强丛书》是为庆贺 70 年校庆而编辑出版的。第一辑《南强丛书》共出版了 15 本专著,这批专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出版后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 9 本书获得了省级以上的奖励。其后,我们又出版了两批《南强丛书》教材系列,同样收到很好的反响。《南强丛书》作为反映学校优秀教学科研成果的载体和形式,已被厦门大学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所认同。

厦门大学是一所有着优良传统的高等学府,历史悠久,声名远播,素有“南方之强”的美誉。在 80 年的办学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理想追求。在世纪更替之际,我校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继承和发扬了陈嘉庚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罗扬才

烈士的革命精神、抗战时内迁闽西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以及王亚南校长、陈景润教授为代表的科学精神,为把厦门大学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在这过程中,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撰写了一批优秀的科学著作,为丰富全人类的文化事业和科学的进步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值此建校 80 年之际,遴选出一批优秀之作出版,是一件有着重要文化意义的事情。

《南强丛书》第二辑的出版,同以往一样,以她的权威性受到了广大教师的关注,广大教师踊跃投稿参评,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收到数十部书稿。这些著作都是作者经多年研究的成果,厚积薄发,值此《南强丛书》第二辑出版之际,积极参与角逐。这批入选的 10 部专著,有的是“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精品,有的是本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校的学术水平。作者中有的是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是近年来在学界崭露头角

的中年新秀,他们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受到瞩目。

由于入选的数量有限,这批《南强丛书》难免有遗珠之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将继续出版《南强丛书》,使《南强丛书》成为反映我校科研和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培养师资队伍的一个重要园地,成为学者与读者互为沟通的一座桥梁。

由于时间急,任务重,无论是在评选还是在编辑出版工作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校友、老师和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厦 门 大 学 副 校 长 吴水澎
《南强丛书》编委会副主任

2001 年 3 月 30 日

热点中的热书

——序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

翻开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发展史，都会见到热点的存在，当然热点不是固定的，一般地说，多因时而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热点。就以汉语音韵学史而言，南北朝时，“音韵蜂出”，韵书和音义书盛行，至陆法言《切韵》集其大成。晚唐五代至宋，切韵之学兴起，“师法多门”。最值得玩味的是古音学的兴衰。清代自顾炎武《音学五书》开始，古韵之学逐渐成为显学，它是乾嘉之学的光辉的组成部分，乾嘉大师戴段钱王都是古韵学领域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我们打开王重民先生编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就会发现，在清代，一个文士如果没有写过古韵学的文章仿佛就不够学者的资格，可见彼时古音学的盛行和普及。而至20世纪下半叶，出版的数十本诗经注、译、论，于诗韵、诗音或谬误百出，或回避不言，能给予正确阐述者寥寥^①，细看作者，方知实为汉语史专家之所为，这说明热点的消失居然使得当今的文学史家成了古音盲，真令人有“不堪回首话盛年”的感喟。自清末陈澧《切韵考》起，特别在高本汉学说传入后，中古音的研究大盛。我们在这里更为关心的是，20世纪初年的北音学的崛起和繁荣，使音韵学由今音学、等韵学

^① 我知道这样的诗经注译书有两本：祝敏彻等《诗经译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黄典诚《诗经通译新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按,唐宋夏金元直至明初皆谓之切韵学)、古音学的三元组合变成了四元组合。长期以来北音学的重点在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的研究,诸家并起,成就卓卓。

我们可以说,近20年来,明清音特别是明清官话音的研究成为音韵学的热点之一,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元代音的研究经过几乎一个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相当充分,很为成熟,学术热点就会转移,一则前移至两宋,一则后徙到明清,“亦势所必至”。明清的音韵学的代表性资料《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西儒耳目资》《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五方元音》等等专书的研究,在前此的基础上,这20年向纵深发展,更深入,更精密,出了不少专论、专著。我看,这20年明清音的研究有个超乎前人的显著特点,就是更明确地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我在这里插说一句,“官话”一词始自明代,我在1985年发表的《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明确指出:“‘官话’一词在元代尚未出现。”潜台词是,有不少论著将《中原音韵》所代表的元代音称作“早期官话”,严格地说,是不恰当的。时隔十余年,还没有人能举出一则真正出自宋元文献的“官话”一词的用例。近年研究明清音的学者在完成了专项资料的具体论述、分析后,不仅不回避“官话”问题,而且积极地参加讨论,踊跃表态。如今关于明代官话、清代官话的异同、各自时间的起止、有无基础方言、官话的性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因而形成一个热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宝奎同志是这“百家争鸣”热点的参与者、制造者之一,他的博士论文《明清官话音系》于1993年写成,通过答辩,七年来,他又精益求精,反复琢磨,终于成就了这部专著。我国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的追求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依我看来,宝奎同志的这部专著可以“成一家之言”了,因为它是热点中的热书。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考察研究近代汉语明清音的著作,带有集成的性质,它所论及的明清音代表资料,除了人们熟知的《洪武正韵》、《四声通解》、《等韵图经》等等外,像藏于伦敦的《罗马字官

话新约全书》、藏于台北的《谐声韵学》都是难得的珍贵书籍，前者得自其师黄典诚先生，后者取材于高雄中山大学林庆勋先生的专论。作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明清官话音作了较为精细的分段描写，将明音和清音分别叙述，明音、清音又各分前后两个阶段。该书描述和考查了明清官话音的基本面貌及其历史沿革；并将官话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北音、南音）作横向共时比较，揭示了二者的差异。作者认为，官话音既非北音亦非南音，而是变化了的传统读书音，官话音与北音、南音同源异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代汉语标准音和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二者原本同源，只是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以及汉语自身发展特殊规律的制约，导致二者逐渐分流。从共时的角度看，官话音声韵调系统与基础方言口语音相比，相同或相似的部分多于差异，即同大于异。这种大同足以证明二者的同源关系，而差异的部分则表明它们又是相互区别的不同音系。从历时的角度看，明清官话音受通俗白话文学和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双重影响，一直跟着口语音的变化而变化，以至二者的差异逐渐缩小，这个事实，同样可以说明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关系的密切。宝奎同志认为，弄清楚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同源异流的关系，可以避免运用分属不同音系的语音材料作类比论证的错误；也有助于对许多语音现象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以往有的学者简单地将汉语近代音当作单一音系处理的做法之所以有错，原因就在于他们未能正确认识这种“同源异流”的关系，他们的考查结果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也无法对一些语音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比方说，明清汉语究竟有无入声的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就颇为径庭，主张保留入声者自然可以举出许多材料，主张入声已经消失者亦复如是。后者接触到保存入声的语音材料时，则简单地斥之为“拟古”、“反映某地方音”等等，诸如此类的解释自然难以圆通。探讨明清官话音的基本面貌及其历史沿革，弄清楚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之间“同源异流”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和研究普通话语音的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那种简单地将现代普通话音系看成是明清官话音的延续，或者认为元明以来的北京音一直是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看法，都是可以商榷的。

宝奎同志的这些观点都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我相信,一定会受到其他争鸣者的重视。关于明清音的研究,如果从赵荫棠、陆志韦二位先生算起,历史并不长,近20年关于官话音的研究才热闹起来,因而无论在准确度、广度和深度上,还需要大大加强,所以学术争论即争鸣肯定会有,会持续下去的。只有争鸣,学术才有活力,才有生命,才能逐渐一寸一寸地趋向真理,靠近真理。

我还有一个想法,讲出来请宝奎同志和其他近代音的专家指正。迄今为止所知的近代音的代表性材料的研究,当然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还需要向纵深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可不可以开辟第二战场?即广泛地甚至力图穷尽式地阅读元明清别集、政书、史书、方志、笔记、小说、戏曲等等,甚至域外文献,爬罗剔抉,从这些大量典籍中搜集语音史资料,披沙拣金,我想,皇天不负苦心人,从这些宝贵材料中得出的结论必然具有原始创新性,也许可以使明清音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层面。最近读到平田昌司先生的《清代鸿胪寺正音考》,这篇文章刊于《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他从《大清实录》、《学政全书》、《礼部则例》、《科场条例》、《筹办夷务始末》等书里开挖出如许多的第一手材料,能不令人推许、叹服?明清书籍汗牛充栋,可资采择者必多,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想投入,肯投入。

还回到宝奎同志的“热书”上来吧,由于多年从事语言学理论和汉语音韵的教学与研究,理论基础扎实,他凭借熟练的音位学和描写语音学的方法对汉语的许多语音史料做了较为深入的考查、描写,各项材料的音系、音类的描写井然而精细,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我相信,这本“热书”的出版对于汉语近代音的研究和普通话语音史的研究定当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会使“热点”更“热”,谨以此祝。

鲁国尧于金陵

2001年2月

序 言

明清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以往研究音韵学的人总以为时代太近，不值得用力去研究，研究现代汉语语音的人追寻其源流也常常一起手就同《中原音韵》挂钩，以致有关的研究至今还很不深入，至今还没有一本详尽的专著。对于有三千多年文字记载的信史来说，明清时期的六百年似乎只是短暂的瞬间，不必深究，其实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版图最广、人口最多、社会生活变革最为激烈的时代，是中国从古代社会走进现代社会的时代，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也发生着诸多重大变化。要了解从古代汉语演变为现代汉语，考察这一段变革是十分必要的。

相对而言，明清官话音在最近的十来年间还是引起了一些音韵学者的注意。就他们陆续提出的研究报告来看，这六百年间的官话音也

并非那么简单。官方所编的作为标准音的韵书如《洪武正韵》、《音韵阐微》等，究竟是否反映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口音？现在所能见到的数十种民间或文人所编的官话韵书应如何为他们作时空的定位和分类？现在的北方官话和江淮官话在前此的五六百年间应是各有所本的，那么，当时的北音、南音和官话音是什么样的关系，和后来的北京音和南京音又是什么关系？和其他方言是什么关系？明清时期诗人的用韵和当时的官韵又是什么关系，凡此种种问题，似乎都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定论。

真正下决心去研究这段语音史，应该说可资应用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除了许多韵书和诗人用韵材料之外，还有不少早期北音、南音的记录（包括外国传教士用罗马字所作的记音），传到域外去的各种官话课本。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就是运用这些资料作研究，从而提出新观点的。此外，关于明清官话和各种方言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有丰富翔实的现代方言作凭据，研究起来也有不少方便。

研究明清官话音有多方面的意义。

就直接的意义说，可以让我们了解从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代音到现代音的演变过程并从而加深对近代音和现代音的系统的理解。

我想，对明清官话音研究的更大意义还是理论上方法上的意义。

历来的音韵学研究重古代而轻近现代，重局部而轻整体，重“考古”而轻“审音”，重共时结构的分析而轻历时流变的考察，这就是传统音韵学和现代语音史的不同。音韵学只有用语音史和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充实和改造，才能更好地揭示汉语历史上的各个共时音系结构的规律以及历代音系演变的规律。就近入手把近代官话音弄清楚，把官话音和当时的基础方言及其他方言的语音的关系弄清楚，把六百年间共同语及各方言的语音演变过程和规律弄清楚，想必对于研究中古音、上古音都会有重要的启示。

汉语早就有书面语和口头语的严重分歧，读书音和说话音不论

在共同语或方言里也有相应的明显差异。历代的韵书有官方的、有民间的，究竟是读书音的音系或是说话音的音系？官方规定的韵书是一时一地音系的反映或是古今南北音的综合？这些音韵学上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也都还没有彻底解决。如果就近入手，先把明清官话及相关问题弄清楚了，同样对于研究中古音和上古音也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叶宝奎博士多年来潜心于明清官话的研究，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就一部一部韵书作比较研究，一家一家地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次一次的音韵学会都舍不得放过，利用各种机会和同道们讨论问题，交流看法。这本专著就是他反复琢磨而成的力作。他把明清两代官话音各分为前期和后期两段，选取若干本韵书和域外对音材料作分析，对各段发音的声韵调系统的归纳和说明是相当清楚明白的。在考察明清官话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研究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差异，注意南北口音的不同，他的结论是：“明清两代的官话音并非一时一地之音，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以传统读书音为基础的，具有十分明显的历史传承性”；官话音“与北音、南音同源异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与基础方言口语音长期并存，这种并存的局面一直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官话音与方言口语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特别是官话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关系至为密切；元明以来汉语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势力与影响不断扩大，官话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俗倾向，逐渐向口语音靠拢，随着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而变化，从语音演变的角度看，官话音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比基础方言口语音缓慢些。”

这样的结论是言之成理，也是言之有据的。本书的发表对于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当能起到推动作用。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关于明清官话音与当时南北音的相互影响，似乎还可以联系现今的国音和南北音作一些比较分析。事实上，任何时代的共同语语音和它的基础方言以及其他方言的语音都是必然要发生相互影响的。在各地方音材料已有大量发掘的今

天，广泛地运用这些材料去追寻它们的历史轨迹，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科学认识。另外所谓“音系”历来都局限于单字的声韵调系统。事实上，自从汉唐之际双音词逐渐占了优势以来，随着唐宋以来虚词、语缀不断增多，和多音词及虚成分相联系的轻声、儿化、连读变调在共同语和许多方言里也形成了新的规律。“音系”者，语音系统也，语音系统不应该只是“字音系统”，也应该包括“词音系统”。就明清官话来说，至少应该有了“轻声”和“儿化”等形态音位的产生。研究明清官话音应该把这方面的现象纳入考察的范围。宝奎同志在方言学方面也有很好的基础，这些事有望于今后把它做得更好，但愿不是苛求和奢望。

整好全稿之后，宝奎见示于我，匆匆拜读之后，有了以上的一些感想，写在这里，聊应作序之托。

李如龙

2000年12月

目 录

总序

序一 鲁国尧

序二 李如龙

绪论

0·1 明清语音在汉语语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

0·2 官话与官话音 (4)

0·3 官话音与方言口语音 (8)

0·4 南音与北音并存 (10)

0·5 关于汉语近代音的几个问题 (15)

第一章 明代前期官话音 (26)

§ 1·1 《洪武正韵》与明初官话音 (27)

§ 1·2 《韵略易通》 (45)

1·2·1 《韵略易通》音系 (47)

1·2·2 本悟《韵略易通》的重×韵 (55)

§ 1·3 《中原音韵》与北曲韵书 (62)

1·3·1 《中原音韵》音系 (62)

1·3·2 《中原音韵》之入声韵 (74)

1·3·3 《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与《琼林雅韵》 (80)

§ 1·4 《洪武正韵译训》与《四声通解》 (84)

1·4·1 《洪武正韵译训》之正音 (88)

1·4·2	《洪武正韵译训》之俗音	(96)
1·4·3	《四声通解》之今俗音	(99)
1·4·4	朝鲜对音文献简介	(106)
§ 1·5	《洪武正韵》与《中原音韵》音系比较	(109)
第二章	明代后期官话音	(114)
§ 2·1	《西儒耳目资》音系	(115)
§ 2·2	《韵略汇通》音系	(132)
§ 2·3	《等韵图经》音系	(140)
§ 2·4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和《韵法横图》	(153)
2·4·1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音系	(153)
2·4·2	《韵法横图》音系	(166)
2·4·3	明代南音特点	(172)
§ 2·5	《西儒耳目资》与《等韵图经》音系比较	(176)
第三章	清代前期官话音	(182)
§ 3·1	《五方元音》音系	(182)
§ 3·2	《音韵阐微》音系	(190)
§ 3·3	《诗词通韵》音系	(204)
§ 3·4	《谐声韵学》与《圆音正考》	(212)
3·4·1	《谐声韵学》音系	(212)
3·4·2	《圆音正考》与尖团音问题	(223)
§ 3·5	《音韵阐微》与《谐声韵学》音系比较	(226)
第四章	清代后期官话音	(229)
§ 4·1	《正音咀华》音系	(232)
4·1·1	《正音咀华》的声韵调	(233)
4·1·2	《正音咀华》音系基础	(239)
§ 4·2	《正音通俗表》所记官话音	(244)
4·2·1	潘逢禧的语音观念	(245)
4·2·2	《正音通俗表》的声韵调系统	(250)
§ 4·3	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音系	(253)

§ 4·4 《李氏音鉴》之北京音	(265)
§ 4·5 清代后期的南京音	(277)
4·5·1 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之南京音	(278)
4·5·2 K. Hemelino《南京官话》.....	(281)
4·5·3 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	(283)
4·5·4 赵元任记录的南京音系	(285)
§ 4·6 官话音与北音、南音比较	(286)
4·6·1 《官话新约全书》与《音鉴》北京音的比较	(287)
4·6·2 《官话新约全书》与《通例》南京音的比较	(289)
第五章 明清官话音的历史沿革	(292)
§ 5·1 明清官话声母	(293)
§ 5·2 明清官话韵母	(298)
§ 5·3 明清官话声调	(304)
§ 5·4 从入配阳到入配阴	(305)
§ 5·5 老国音与明清官话音的终结	(310)
主要参考书目	(315)
后记	(317)